

屏息！记录经典时刻



由我定格的历史

后悔，错过那一瞬间



“2005年4月29日，胡锦涛与连战在北京握手相握，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相隔60年的首次会见。”这是摄影家贺延光老师拍摄的《两党一

小步 民族一大步》新闻摄影作品的图片说明，当时我也在现场，但我没拍到，现在想起来还在后悔。

我接到去人民大会堂的通知是在当天上午，当时就是一阵兴奋，之前类似这样的活动是不邀请地方媒体采访的，往往各地方媒体都转载新华社的报道，此次邀请了地方媒体采访实在不多见，实属难得。

大会堂东门，无数记者从四面八方赶来，扛着梯子，背着三脚架，拎着大包小包自觉整齐地排好队伍。安检之后，所有记者都是拿好设

备疯一般跑到指定采访地点，占据最有利的地形。我不慌不忙，溜溜达达到了人民大会堂北大厅，摄影记者区域是个一尺来高铁架子，我到的时候已经被记者占据了，我只能躲在一个相对偏僻的角落里等待采访的开始。之后的情况我不说大家也应该明白，在一阵劈里啪啦闪光灯的渲染下，采访结束。

第二天，我看到贺延光老师的大作《两党一小步 民族一大步》，我才知道什么是差距，才知道该学的还有太多太多。

晨报记者 蔡代征

在我身边的历史

彻骨，股市冷热变幻



2005年的6月6日，在这个炎热的夏日，上证综指驻足在998.23点的8年低点，到今天，我仍记得那时心里感到的寒冷。

那一天，我正在营业部

采访。散户大厅人员稀疏，有人在大屏幕前发呆，有人在下棋。而当股指跌破千点的瞬间，投资者眼里噙着泪，却自嘲地鼓起了掌。

事实证明，中国股市就是在998点的冰点再次崛起，进入新一轮牛市。当时的我们并不知道，在接下来的两年里，股市进入超级牛市，登顶6124.04点的巅峰，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加入其中，在任何场合，你都能听到有人在谈论股市；当时的我们更没有想到，冲向万点的预言话音未落，让人始料不及的杀跌便又一次光临，直

到眼下的7月，A股的最低点是2566.53点。全民皆股的时代刚刚开始，财富缩水过半只需半年！

这两场痛彻骨髓的下跌，股民在精神上、财富上备受折磨，作为证券记者，我们感同身受，而我们的报道，一直站在股民一边，希望对他们有所帮助。中国股市10年涨跌，初入市场者或许难以接受，但不经历风雨，又怎能见彩虹？要记住这个道理：欢乐时及时兑现利润；痛苦时坚定信心，痛并快乐地成长。

晨报记者 王洁

由我见证的历史

礼赞，为了记住历史



1937年7月7日，在北京西郊卢沟桥附近爆发了中日军事冲突是中国全面抗战的开端。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，历史教科书上有

文字描述，但相关的历史照片却很少。《伦敦新闻画报》记者当时在第一时间进行了详细报道，拍摄了反映事件全过程的一系列图片，既有展现中国军人英雄风貌的人物写真，也有记录日军蓄意挑衅的历史罪证。

2005年7月7日，《北京晨报》用4个版的篇幅，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再现，跨越时间的注释，跨越空间的追访，跨越版面的呈现……68年前，一位西方记者用他的镜头，为历史保留了一个中立、客观的立场。68年后，我有

幸和晨报的同事一起，为读者打开了这段历史的窗口。

2008年7月7日，当我隔着1000多个日日夜夜，重新回忆那段日子；当我隔着北京晨报报道汶川地震的图片，重新翻看这些版面，最让我难忘的却是那双眼睛。虽然我一直无缘结识照片的“制造者”，但在与这些老照片的无数次对视中，我始终能感受到那位冷静、勇敢的目击者，他高举的是另一种武器——照相机。

晨报记者 王颖晨

有我足迹的历史

混迹，菜鸟搞掂超女



2005年8月，我到晨报4个月，“超女”红得一塌糊涂。一日领导曰“超女，去一下”。我无奈领命，打上飞机。刚入行的菜鸟，手上资源少之又少，在黄花机场迷茫的我询问机场地勤：“长沙有几个电视台？”

顶着烈日赶到位于长沙郊区的广电大厦，硬着头皮让李宇春的叔叔带我混进彩排现场，厚着脸皮将她妈妈堵在演播大厅的角落采访。对方发着“我想见女儿也难”的抱怨，我心猿意马地盘算着隔天如何能再混入这里。走出T2演播室时已是凌晨1点，我又摸到广电大厦后方，通过个把小时的埋伏蹲点，我掌握的基本信息有：这里有以十二星座命名的别墅，而李宇春、周笔畅等人两人一家住在“金牛座”、“狮子座”中，湖光山色中还隐藏着若干“玉米”、“凉粉”、“盒饭”。

第二天，我与主办方斗智斗勇大半天，却拿不到一张入场券，距离晚上的现场直播越来越近，我却只能在演播室门口逡巡逡迤，山穷水尽的前一刻偶遇一群“盒饭”，套近乎后获得一张宝贵的门票，那是我第一次进入“超女”比赛的直播现场，顾不上发什么感慨，只能忙着把看到、听到的写下来，通过短信传回报社，那时我的手机一条短信最多编70字，而我要写超过千字的文章。那时也没有飞信，还要感谢当天的编辑王汀把千字的短信一一敲到电脑上。

入湘三天，最难忘的一刻是在我路边徘徊不定时，一个男同学给我打来电话，“我从云南回来给你们宿舍带了百合花。”我也因此错过了迄今为止唯一一位给我送花的异性。

晨报记者 王琳



[这一年我进入晨报]

见证女足换帅大戏

2005年，我成了晨报的一名体育记者。由于之前对足球了解很少，当领导将女足和足协的报道任务交给我时，心里真是恐惧。后来跟着前辈们采访了几次女足训练，又在足协当年的小办公楼里蹲守了几次，越来越觉得女足和足协的新闻其实离赛场很远，人和人的博弈才是主戏。那年6月，刚率武汉队在中超取得7连胜的裴恩才接任女足主帅，可这位男队转女足的教练先是传出和队员不和，随后又在东亚四强赛垫底，11月就交出了教鞭。足协随后又像雅典奥运会前那样搞了一次“主帅竞聘”。面对2008年奥运会这么大



的诱惑，竞聘阵营一时人满为患：元老们推荐马元山复出、殷铁生毛遂自荐、代理主帅王海鸣自认能被扶正、坊间则传闻马良行将接过教鞭。后来足协将“包围圈”缩小到了马良行和王海鸣两个人，结果马良行胜出、王海鸣任助教。硝烟散尽，本应“最

不靠谱”的坊间猜测竟然成真。我大概明白了，原来中国足球就是过家家，入职时的那种恐惧实在多余。

3年过去了，曾为竞聘而挤破头的人中没有一个人等到他们所盼望的奥运会。马良行在风波中隐退，瑞典人多曼斯基和法国人伊丽莎白这两个后来者也纷纷落马，就连长期扎根女足的王海鸣也已杳无音信……总有人批评现在的女足太差，不如当年的那批“铿锵玫瑰”。如果这些人也像我一样伴随女足走过了这些年，我想他们将像我一样，对于姑娘们只剩下同情。

晨报记者 喻晓